

# 古代以农立国,如何储粮安天下

重视粮食储备是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。数据显示,我国储备的主要粮食已超过全球库存量的50%,是世界第一储粮大国,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

民以食为天,粮食安全是“国之大事”。那么古人在粮食仓储和粮食供应安全方面是怎样做的,有哪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?

## 储粮备荒起源早

古代先民十分重视粮食储备。

在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(距今8000多年),考古学家挖出了189个“粮仓”,能储存粟至少5万公斤,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,这样的储粮规模令人惊叹。

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的池中寺台地,考古学家勘探出一片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,显示出城内巨大的粮食储藏量。

甲骨文中有关派官员巡察仓廩的记载,说明商代已经有了较健全的粮食储备制度。《周礼》记载,西周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均设有储备仓库,其中就包括粮食储备。具体执掌储备的官员叫“遗人”,他的职能是:掌管王国的委积(指粮食等财物储备),用来向民施以恩惠;掌管乡里的委积,用以救济乡民中饥饿困乏的人;掌管门关(国门和关门)的委

积,用以抚养为国牺牲者的家属;掌管郊里的委积,用以供给出入王都的宾客;掌管野鄙(距京城三百里以内的地区)的委积,用以供应往来的旅客;掌管县都的委积,用以防备灾荒。

今天,我们所说的粮食储备调控制度,一般认为源起于战国时魏文侯相李悝在魏国实行的“平糶(dí,意为买进粮食)法”。这一制度是政府运用财政力量和价格手段来调控粮食供应,稳定粮价。

“平糶法”根据年成好坏,把好的年成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,坏年成也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,国家按年成好坏收购或卖出相应数量的粮食。比如遇到大歉收年,就把大丰收年收购的粮食增量拿出来卖,用以平衡市场的粮食供需。平糶的结果是,“虽遇饥馑、水旱,余不贵而民不散,取有余以补不足也。行之魏国,国以富强”。

平糶法限制了不法商人对



图为位于陕西省大荔县的丰图义仓,建于清光绪八年(1882年),占地面积11039平方米。建筑格局为城中城,分内城和外城,外城坐东朝西,夯土筑城,是义仓防御的第一道防线,内城以仓墙合一的建筑形式构筑,兼具防御和仓储双重功能。慈禧曾御封其为“天下第一仓”。图片来源:央广网

粮食的投机活动,有效地防止了农民破产和贫民流亡,维持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。

## 官方与民间共发力

秦汉以后,粮食储备和调剂制度相当繁杂,但大体不出两类:一是国家兴办的“常平仓”,调控市场、平抑物价、为民理财。二是民间兴办的“义仓”,由于多建立于最基层里社,也称“社仓”,主要用于具有慈善性质的粮食救济。

汉宣帝五凤四年(公元前54年),大司农丞耿寿昌建议在

边郡设置常平仓,谷贱时增价籴买,谷贵时减价出卖。白居易曾评价:“盖管氏之轻重,李悝之平糶,耿寿昌之常平者,可谓不涸之仓,不竭之府也。”

常平仓可以说是一个建立于供给与需求两端之间的“蓄水池”。当农业丰收,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,为防止谷贱伤农,国家加价收购市场上的粮食;在农业歉收,市场需求大于供给时,为防

止谷贵伤民,国家将丰年收购的粮食低价卖出,在这一进一出之间,平抑了市场物价。

义仓,一般认为创立于隋开皇五年(585年),大致可分为两类,一类是由地方官员牵头组织民众捐助并管理;一类完全由地方士绅自行建立并管理。隋代工部尚书长孙平看到天下多水旱,建议民间秋熟时每家出粟麦一石以下,以备凶年。开皇十五年(595年)义仓改为官办,变成一种强制性粮食征税,由政府控制。唐

代承袭隋制。由于政府控制,隋唐的义仓有名无实。

真正意义上的义仓起源于南宋。南宋大儒朱熹于乾道四年(1168年)在福建崇安(今武夷山市)办社仓,在青黄不接时给乡民贷米,乡民在冬天连本带息按120%归还。小歉时利息减半至10%,大饥时利息全免。此举相当成功,至淳熙八年(1181年),社仓已积有米3100石。

明清时期,劝善之书广为流行,民间行善之风大行,捐建义仓活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。在推行社仓的同时,政府积极鼓励民间大力发展义仓,使得义仓逐渐增多并在很多省份普及,为保障社会粮食储备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,农业是国家经济命脉,粮食安全关系着国计民生,各朝各代无不把它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地位。

故仓储粮食,以备不时之需,成为一种历代常规的制度,政府与民间共同用力,为保障民生与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这种粮食调控制度,以不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为前提,实现了调节粮食供求关系、稳定粮食价格、保护粮农和消费者的利益、救灾备荒及维护社会稳定等多重功能,意义深远。

翟玉忠(摘自中国新闻网)

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,对于这样一部著作,我们究竟该如何读呢?

读《红楼梦》,不去读其中的故事、不求理解故事的本意,专在细枝末节上探求奥秘,这样的读者并不少。他们的兴趣在于某人的药方中隐藏着什么密码,史老太君跟玉虚观的老道是何关系,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谁挨着谁坐的,等等。

从《红楼梦》一问世,就产生了一个怎么读的问题。读法不同,理解各异。正如鲁迅所说,“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”。今天还可加上“政治家看见阶级斗争,解梦家看见清宫秘史,大红学家看见青春与爱情”。把这些标签往《红楼梦》上一插,一部本来通俗易懂的小说被弄成了一门“玄学”、一个大谜语。

俞平伯先生说得好,《红楼梦》就是一部小说。小说是文学作品,是根据主题需要所创作的。《红楼梦》之所以名列中国四大名著之首,窃以为首先是它的故事性和文学性。抛开那些标签、避开那些误导,把它当作小说来读,看曹雪芹讲的故事、欣赏曹雪芹的文笔、领会曹雪芹的用心,你就会发现:它原来是很有意思的。

曹雪芹是讲故事的高手。他编造的故事一波三折、引人入胜。而他的故事又是有的、有用意的。讲凤姐过生日,写众人怎么攒钱凑份子,凤姐

## 读《红楼梦》,首先要把它当作小说

怎么喝醉、撞见贾琏偷情,平儿怎么无辜被打……讲这些为的是什么呢,原来为的是给贾宝玉向平儿“尽一次心”做铺垫。不信请看第四十四回“喜出望外平儿理妆”。平儿受屈,谁“喜出望外”?宝玉。曹雪芹唯恐读者看不明白,在这一节里,“尽心”一词出现了三次。为了能让香菱进大观园,曹雪芹营造了薛蟠调情挨打、为遮羞脸外出做买卖、薛宝钗让香菱进园子跟她就伴儿,这才给了宝玉跟香菱一起玩“斗草”、有了帮她“情解石榴裙”的机会。

曹雪芹笔下的每个故事都有个小主题,小主题又是为大主题服务的。这个大主题是什么呢?不是宫廷秘史,不是青春爱情,而是四大家族“贾王薛史”的谐音——家亡血史。小说中宝黛没有结果的爱情,不过是串起诸多故事的一根线而已。所以,四大家族实是贾氏一族。而造成贾氏衰亡的原因,在第二回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就已经点明了:一个是过日子排场费用过大、不知节俭,一个是儿孙不争气。小说中的所有故事,都是围绕这两大因素展开的。

先说头一个。小说通过宁国府给秦氏办丧事、荣国

府修大观园这两件大事,充分展示了贾家的穷奢极欲、挥霍无度。

贾珍给儿媳妇办丧事,说要“尽我所有”;对请来帮忙的凤姐说:“别存心为我省钱,只要好看为上。”以下就不是细枝末节了:一副棺材板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,没人敢买(也买不起),一千两银子也没处买去;为使葬礼风光些,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给贾蓉捐了个官衔。

丧事刚完,喜事又来。贾元春晋封贤德妃,要回家省亲。建造省亲别墅,光“下姑苏请教习、采买女孩子、置办行头乐器”,就要用三万两银子;置办花烛、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,又要两万两银子。这还没算土木、砖瓦灰砂石的费用。

元妃省亲之日,大观园内“各处帐舞龙蟠,帘飞彩凤,金银焕彩,珠宝争辉,鼎焚百合之香,瓶插长春之蕊”。元妃“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,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”。会亲之时,又劝诫她的长辈:“以后不可太奢,此皆过分之极。”临别之时再特别叮嘱一句:“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,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!”——曹雪芹唯恐读者只把注意力放在儿女情爱上、放在隆重的场面上,所以让

贾元春说了三次“奢华靡费”。

元妃省亲对荣国府意味着什么?第五十三回借贾珍之口说了出来:“再两年再一回省亲,只怕就精穷了。”

除了这两件大事之外,还有史太君两宴大观园、荣国府元宵开夜宴、五月节清虚观打醮等。在吃、穿、用等细节上,也有充分体现:贾府吃顿螃蟹要七八十斤,搭上酒菜一共要二十多两银子,相当于庄稼人一年的用度(第三十九回)。冬天,贾母要进补,吃的是“没见过天日的东西”——牛乳蒸羊羔。宴席上的那些山珍海味不必细说了,光一个茄鲞,用刘姥姥的话说:“我的佛祖!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!”冬天公子小姐们穿的御寒衣物,都是珍稀材料做成的。用旺儿媳妇的话说:“哪一位太太、奶奶的头面衣服折变成了,不够过一辈子的!”用的就更不用说了,夏天潇湘馆用来糊窗户的,是比蝉翼还薄的丝织品“软烟罗”——曹雪芹在这个题目上花费的笔墨实在太多了,可惜可叹的是:大多被人曲解了。

说到儿孙们不争气,头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贾宝玉。第五回借警幻仙姑之口说道:贾家子孙虽多,竟没有一个可以继业者,惟有宝玉一人略可望成。

所以,他才被冥冥之中的先祖寄托了无限的期望。可是他呢,整天在女孩子群里瞎混,不喜读书、不走正路,辜负了天恩祖德,最后一事无成、半生潦倒。其余男子就更不用说了,吃喝嫖赌胡作非为,最终导致被抄家。第一〇六回,贾母含泪祝告天地:“必是后辈儿孙骄侈暴戾、暴殄天物,以致合府抄检……”可谓是曹雪芹用来点睛之笔。

说到底,小说的主题是服从于作者写作目的。曹雪芹这本书,本是为那些纨绔子弟作警示的。他的本意是:不能像贾家这样过日子,不能学贾宝玉的样子。这一点,清朝嘉庆时代的纳山人就说过:

(《红楼梦》)反复开导,曲尽形容,为子弟辈作戒,诚忠厚悱恻,有关世道人心者。顾其旨深而词微,具中下之资者,鲜能望见涯岸,不免堕入云雾中,久而久之,直曰情书而已(《增补红楼梦序》)。

毋庸讳言,近三百年前的曹雪芹价值观、是非观、爱情观跟今天的我们不可能一样。他既不可能反对皇权,也不可能反对孔孟。在婚姻上,他仍然认同“三从四德”。但这些都妨碍我们读《红楼梦》。我们完全可以在阅读中欣赏、学习他的文笔,吸收他善于架构故事、塑造人物、渲染场面的长处。而这方面,恐怕正是我们许多人所欠缺的呢。

宗春启(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)